

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七七年冬



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七七年冬

目錄

中文大學第二任校長.....	一
訪問候任校長馬臨教授.....	二
第十八屆頒授學位典禮.....	六
中文大學融滙中西文化.....	十八
各界捐贈.....	二十
封面：第十八屆頒授學位典禮	



「中文大學校刊」為純粹報導性之刊物，由中文大學出版，贈予大學教職員及各方友好。

大學校刊編輯委員會

宋 淇先生（主席）

姚啓昭先生

張端友先生

陳德全先生

陳燕齡小姐（祕書）

校刊編輯

宋 淇先生（編輯）

陳燕齡小姐（副編輯）

攝影

李旭初先生

通訊處：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第二任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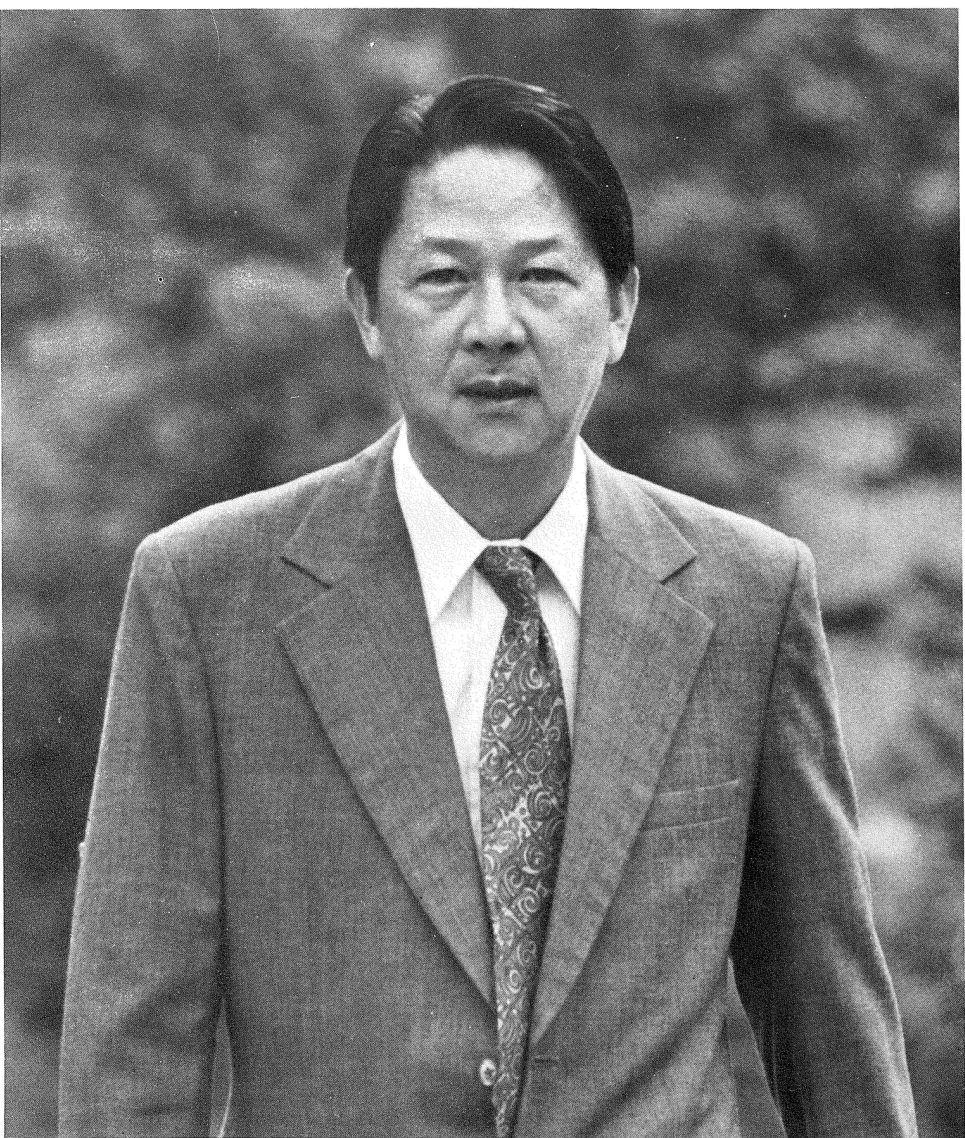
中文大學校董會宣佈：在李卓敏博士退休後，中文大學校長一職將由本校生物化學系講座教授馬臨博士出任，任期由一九七八年十月一日開始。

馬臨教授出生書香門弟，曾在香港英皇書院就讀，後赴四川成都，入華西大學主修化學，一九四七年獲理學士學位。旋赴英，入里茲大學深造，研究蛋白化學，一九五五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繼入倫敦大學醫學院及里茲聖占姆斯醫院，從事資深深博士研究工作。一九五七年應香港大學之聘，返港任教。一九六五年轉任中文大學高級講師，負責籌設生物化學系。一九六九年休假期間，曾前往美國加州大學荷爾蒙研究實驗室工作。一九七二年升任教授，一年後再擢升講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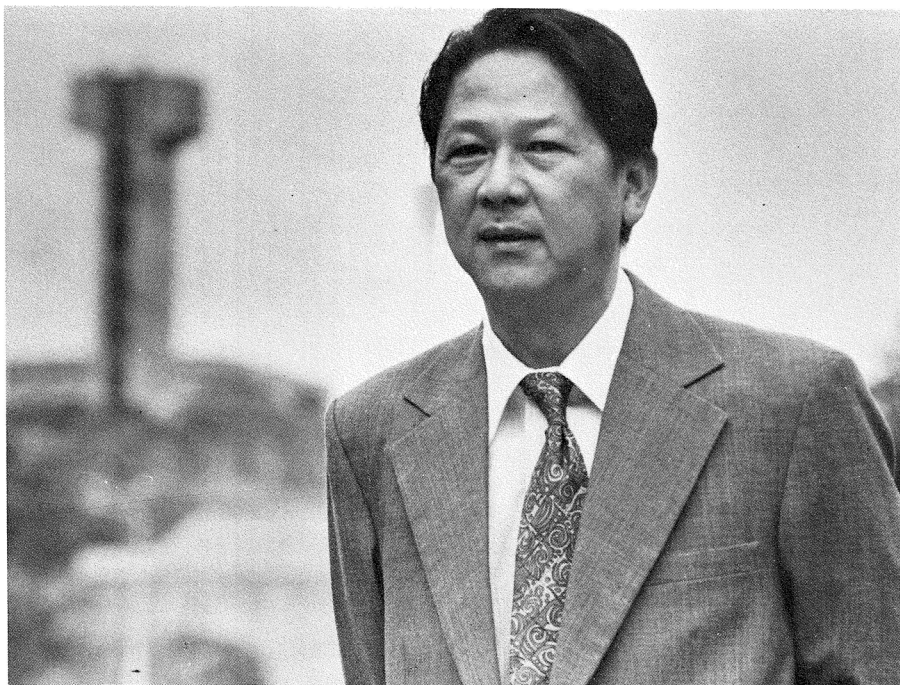
馬教授著作繁富，在國際學術期刊常有有關臨床生物化學及葡萄胎研究之論文發表。

馬教授任職中大後，在大學行政方面，歷負責重，曾任大學理學院院長，現任大學校董、教務會若干屬會之委員、教務會師生諮詢委員會主席、生物化學系務會主席。馬教授對於香港社會之貢獻，亦為人稱道，現任香港政府科學協進委員會及醫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馬教授現年五十二歲，夫人陳萌華醫生在本港執業，膝下三女。



候任校長馬臨教授



問：馬教授，由下學年開始，您將出長中文大學，任重事繁，目前的教研工作想必難以繼續，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魚與熊掌，您是如何選擇的？

答：我自研究院畢業以來，一直從事科學研究和在大學執教。研究科學的人要窮自然之奧秘，往往畢生為研究工作埋頭於實驗室裡，這是一種比較靜的生活。做校長是不同的。校長是大學的學術兼行政首長，他要處理的不再是專門的學術問題，而是大學整體的活動和發展，他需要跟不同的人士接觸，建立聯繫，解決問題。我很清楚做了校長多少要放棄目前的教研工作，生活方式也要改變。那麼，我為什麼要接受這份新職呢？

李卓敏校長在過去十幾年當中，為中文大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製訂了正確的發展方針，在他退休之後，鞏固基礎，繼續發展的工作需要人負責，現在既然選中了我，我就要有所抉擇。一個科學家 and 一個大學校長的工作性質雖然不同，但意義卻同樣重大——對學術知識有所貢獻固然重要，為社會培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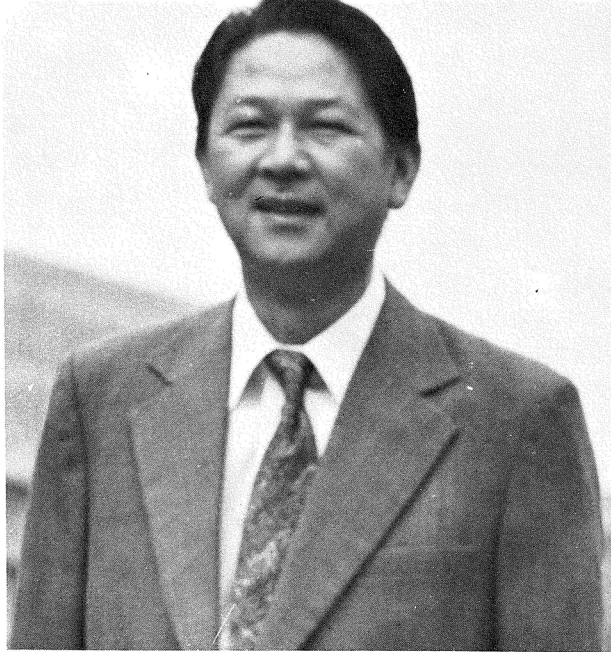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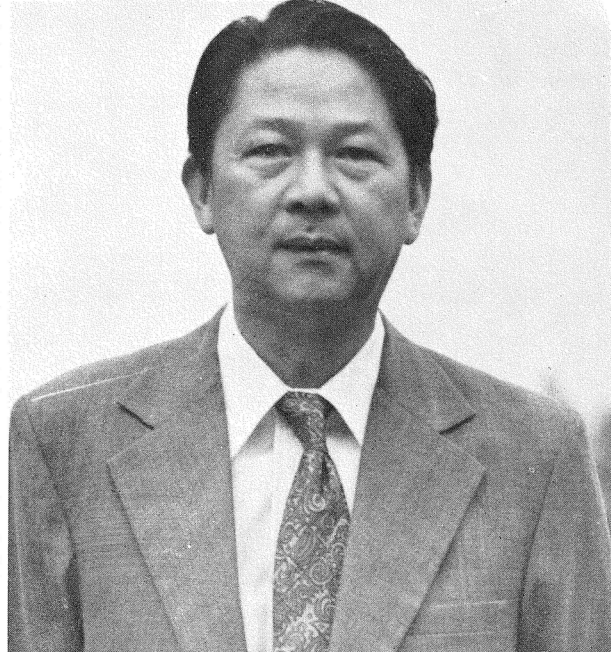
人才也同樣需要。中文大學的教育理想和我個人從事教育工作的理想也極為吻合，我相信中大不斷發展，我個人的理想就可以同時實現。因此我決定接受這新的挑戰，並希望我能夠適應這項工作和生活上的改變。

問：您所說的教育理想，是不是除了教育青年，為社會培育人才之外，更要發揚中國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答：是的，這是我們主要的教育理想。其實，凡是大學都應該負有雙重任務：對社會國家的和對知識文化的任務。中文大學以發揚中國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就是要負起對知識文化的責任。我相信這也是每一個現代中國人所應該肩負的特殊使命，而中大尤其具備極多有利於實現這一使命的優越條件。

問：中大怎樣去完成這個特殊的使命呢？

答：要溝通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首先就要對本位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大為了確保學生



對中國文化有足夠的認識，所以規定要中文科合格方可入學，而且一年級學生必須修讀「大一國文」的課程。本校大部分教師都會兼受中國和西方的教育，所以由他們來推進文化溝通的工作是十分合適的。同時，本校師生都兼通中英文，而在香港，中英文的書刊和資料豐富，可以利用，這無疑也是非常有利的條件。

中文大學很清楚自己的這些特點，因此在課程設計、研究和出版方面，都力求發揮這些特點。比較明顯的例子有翻譯、比較文學等課程的開設、中國文史和中藥的研究、以及出版中國文化研究書刊、中國名著的英譯、以介紹中國文化為主的英文雜誌「譯叢」及「譯叢叢刊」、和西方社會科學經典著作的中譯本等。

此外，由於中不和不少歐美高等教育機構的關係密切，所以有多項教師和學生的交換計劃推行，這不但有助於中西學術的交流，並且也促進國際間的相互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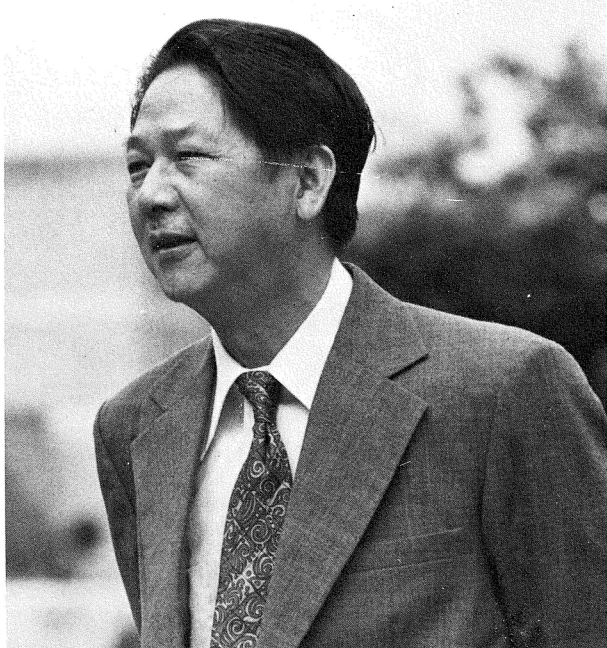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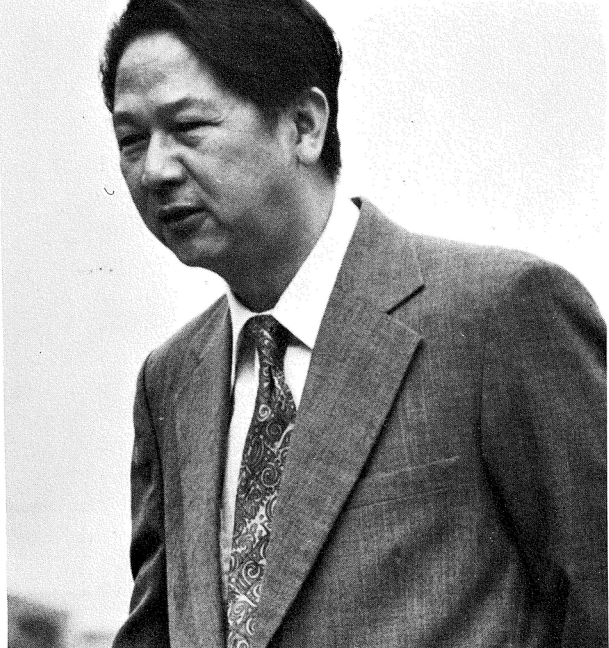
順便要說一說的是，文化交流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是有很大裨益，因為發揚本位文化並不是閉關自守就可以做到。中國文化的特性是兼收並蓄，而取精用宏正是我們現在應該做的。

問：馬教授，如果我們說您是地道的香港市民，相信您也不會反對吧。您對於香港一向對專上教育的要求一定瞭如指掌，現在中文大學的發展，是否符合社會的一般要求？

答：我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當然算是地道的香港市民。自從五十年代末期以來，香港社會對專上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一方面中學畢業生的人數年年多有增加，要求繼續升學的人數相應大增，另一方面，本港工商業急劇發展，在在需要受過專上教育和專業訓練的人才為各種行業服務。中文大學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中大建校以來，時刻都留意本港社會的發展和新的需求，以此來擬定自己的發展計劃。遠的且不說，一九七四年我們就成立了工商管理學院，銳意為工商界培育領袖人才，並於本學年起開設三年制夜班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便利在職人士深造。此外，又成立醫學院，將於一九八〇年開始收生，一九八七年就可以為香港訓練出我們的第一批醫生了。我們又鑒於香港中學需要大量有專業訓練的教師，因此不斷擴充教育學院，新近開設的有二年制日班課程，利用週末和暑期上課，使更多在職畢業教師能夠接受專業訓練。說到專業訓練，研究院由一九七七年開始，增設兩項碩士課程——社會工作學及傳播學課程，也是針對社會的需要而設的。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電子系的五年制本科工讀課程，該系的畢業生對本港最大工業之一的電子業已經有了不少的貢獻。

問：再進一步說到香港整個的教育制度，相信您對這問題除了有身為大學首長應具有的關心外，更有像一般家長的期望吧，因為聽說



您的三位孩子都在本港的學校就讀。可否請您略為談談這個問題。

答：批評香港教育制度不完善的人實在太多了，例如說這制度只着重智育而完全忽略了德、體、群、美，而所謂智育也只是「死讀書」以應付繁重的考試，這制度造就出來的學生多數缺乏適當的思維和判斷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運用中英語文的能力也不夠。這些批評我大體都同意，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和家長，也頗引以為憂。

說到如何改善這教育制度，也有不少人提出過意見，我的看法是：全港的中學和小學因師資和設備不同，程度很參差。人人都想進好學校，因此甄別選拔學生就要靠考試；入學競爭越激烈，考試就越多越繁重。為了應付考試，學校什麼事都不管，只能顧到怎樣訓練學生參加考試，得到好成績。成績至上的風氣、考試壓力就是這樣來的；而這樣的壓力，從幼稚園就已經開始了。因此我認為要扭轉局面，首先凡中小學程度較差的，就要設法加以提高，單是談取消各類考試，未免近於忽視基本關鍵所在。當然，高等教育的情況又當別論，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盡量爭取增加大學中的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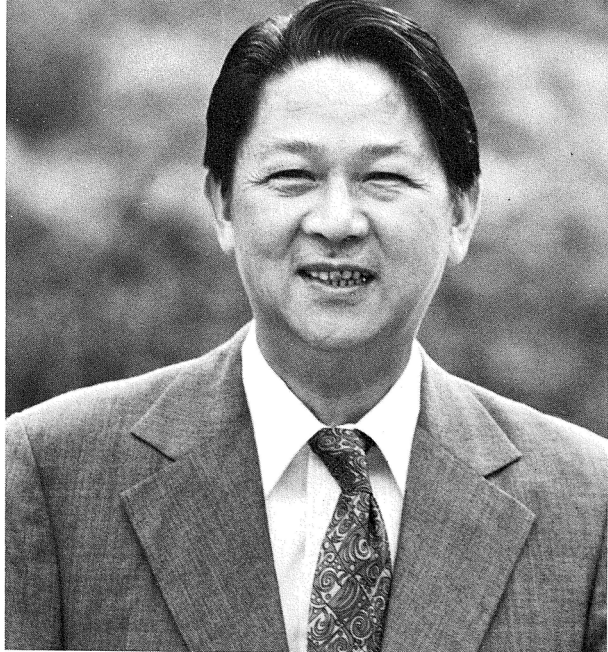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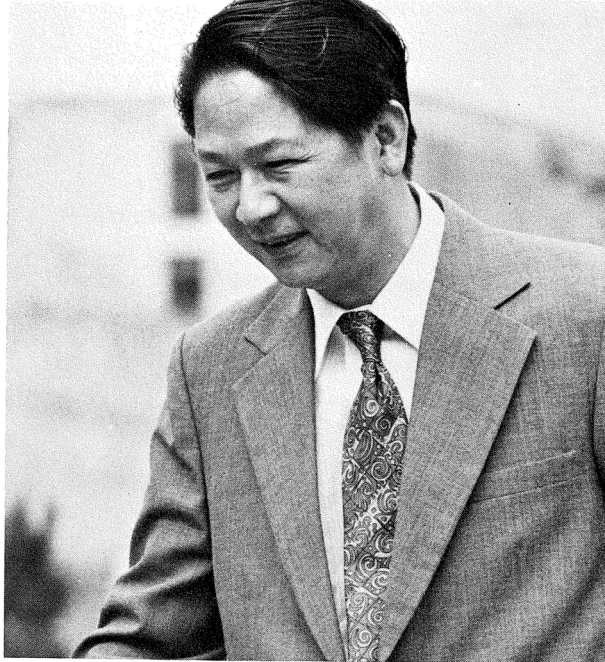
問：您是一九六五年加入本校服務的，到今年已經是第十二年了。對於一所只有十四歲多的大學，您可說是從小看着它長大，因此對於中大的組織一定有很深切的了解，對中大

的師生一定很熟識，請您說說對中大的組織和師生的看法。

答：中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因此也有年輕人的優點和缺點，它有衝勁、活力，不故步自封，但同時又因缺乏經驗而時有不可免亦犯錯誤。在這十多年來，社會人士對我們可說常有批評，這是我們應該引以自慰的，因為最低限度說明我們得到了社會人士的關心。對於善意的、合理的批評，本校都能虛心接受，為大學的改進和發展資以為他山之助。

至於我對中大的看法，首先我要聲明：我和中大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難免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感，不過，反過來說，又因為我在此山中，所以往往會看到一些外人看不到、體驗不到的地方。中大的組織自建校至今，基本上都實行聯邦制，這對由三所成員書院組成的中大是最適合的。以前聯合、新亞和崇基分設於香港、九龍、新界三地，由於地理上的距離所造成的困難，成員書院在行政和教學上差不多是各自獨立的，而大學本部則負起統籌的工作。後來聯合和新亞書院也都陸續遷入沙田校園，三所書院既集中一地，行政和教學工作的重複就成了無謂的浪費，因此中大決定接納第二次富爾敦委員會的建議，由一九七七年——七八年開始改組。由此看來，這次的改組是絕對必需的。

說到中大的師生，我發覺大家都真以成為中大的分子為榮，與中大認同。我們的歷



史很短，可能還未有自己的風格，但只要師生有共同的理想目標，對學校有歸屬感，是不難樹立起獨特的風格的。

我們的教師大部分都是抱着要為本港華人社會服務的心來本校任教的，所以他們都願意為學生、為學校多盡一點力，多訓練優良的人才。我們的學生，大部分都不是富有家庭的子女，他們都很珍惜讀大學的機會，因此勤奮向學，同時又能夠時刻關懷培養他們成才的社會，盡量做到從社會來到社會去，而不是把自己緊緊關在象牙塔內。假以時日，他們對社會必定會有更大的貢獻。

問：請問現階段的中文大學，發展的重點是放在那幾方面？

答：早期的中文大學大致上是一所文理學院，其後逐漸增加專業和實用的科目，現在為了使大學更平衡發展，我們仍需將重點放在實科目上。

在未來數年內，中大將會以全力開辦醫學院，此外又計劃將電子計算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等課程由副修改為主修，另開設統計學副修課程。在研究院方面，亦將增設實用科目的學部，而教育學院內的二年制日班教育文憑課程將大事擴充，以配合香港教育綠皮書所提出的大力發展中學教育的建議。

教學之外，我們也將致力於拓展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工商管理學科研究所將成為中大的第四個研究所，此外，在社會人文學科研

究所下將增設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下增設中國藝術考古研究中心，並將原有的翻譯中心改組為比較文學與翻譯中心。大致上說，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研究會繼續佔很重要的地位，在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方面亦然，理工研究所下的中約研究組的積極發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又為了加強中大對社會的服務，校外進修部和中大出版社也都是發展的重點所在。

問：最後，要成功地發展中文大學，以達到理想的教育目標、提高國際上的學術地位，您將會採取怎樣的領導方針？

答：中文大學發展至今，已經上了軌道，要繼續穩步向前，達到我們的理想，則有賴全校師生的衷誠合作，如果真的要談領導，我所能做的只是盡量促進全校團結，上下一心。我對大學的基層同事比較熟識，他們都具有中國人傳統的美德：忍讓，在一個大目標大前提下，能夠異中求同就是繼續成功和發展的保證。

在內談團結，對外則談開放。你們也許已經聽我說過很多次了，中大沒有校門，就是我們不願意在大學與社會之間築起門牆相隔開來的最形象化的說明，我有信心，對自己和對校內所有人士都有充分的信心，我們必能繼續抱着開放的態度和坦誠的心懷和校外的社會打成一片，共同為我們的理想而努力。

第 十 八 屆

頒 授 學 位 典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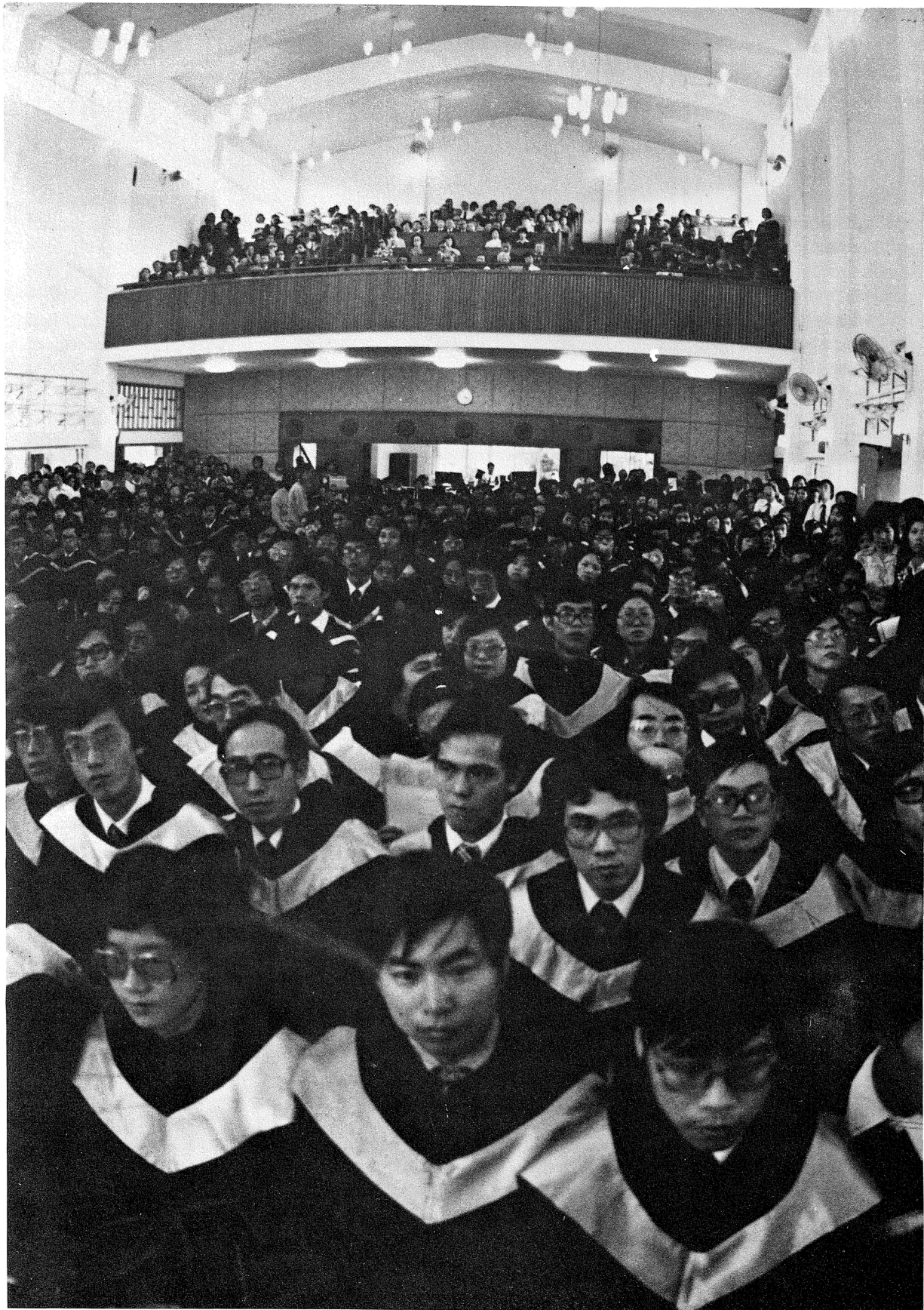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在校內舉行第十七屆頒授榮譽學位及各科學位典禮，由港督兼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主持頒授儀式。

本年獲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兩位知名人士為：環球航運集團董事局主席包玉剛博士及耶魯大學中國歷史學講座教授余英時博士。典禮中余英時教授代表榮譽博士致詞。

榮譽博士的讚詞由大學副校長鄭德坤教授宣讀。

中文大學本屆共有八百三十三名畢業生考獲碩士及學士學位：計哲學碩士五十二人，工商管理碩士二十人，文學碩士四人，文學碩士（教育學）一人，文學士一八三人，工商管理學士一四一人，理學士一九四人，社會科學學士二百三十八人。







榮譽法學博士讚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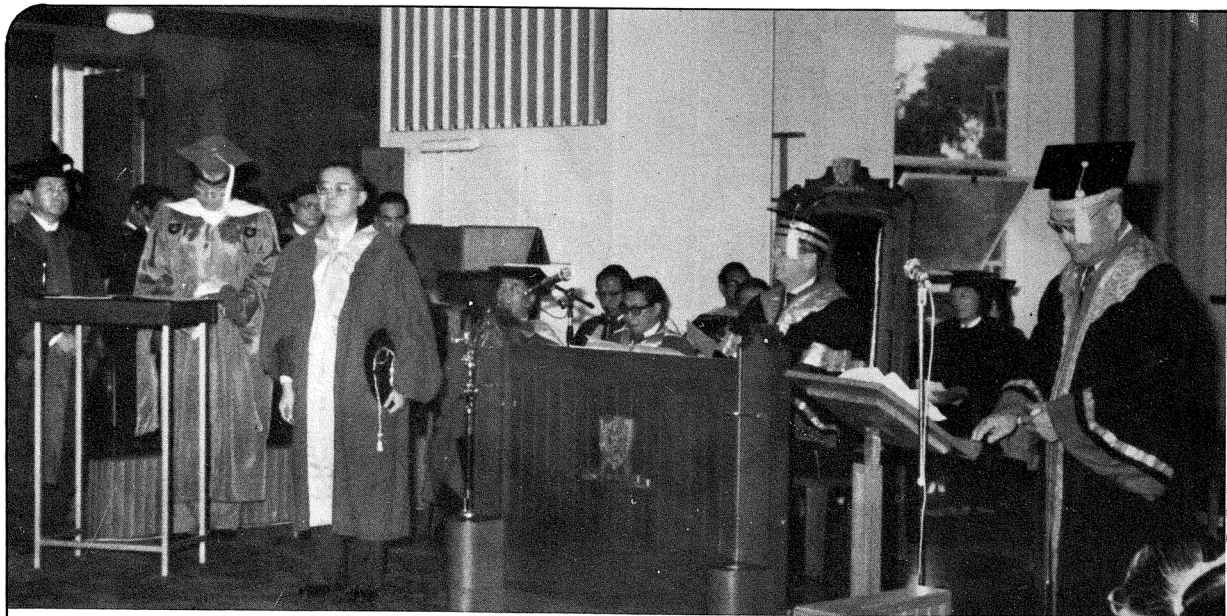
包玉剛博士

包玉剛博士是世界聞名的航業家，擁有一百六十艘巨型船舶，縱橫四海，享譽全球。他的環球航業集團名副其實，可是在最初創業時，粗具規模，然後如日中天。

包玉剛博士原來在上海從事銀行業務。一九五五年在香港購進第一艘輪船，創立他的航運事業。他雖然在這方面缺乏經驗，可是憑着他經商敏銳的眼光和過人的魄力，主持環球航業集團，歷經風險，一日千里。今天包玉剛博士已經是實至名歸。除了身為環球航業的董事長，國際財務公司和香港興業金融公司的董事長，並且還擔任日本、英、美、許多航運公司及銀行機構董事職務。

六十年代中期，包博士就已經對本港的教育和教育機構全力支持，首先創辦環球海員訓練學校。一九七二到七四年，他出任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對本校和香港大學都慷慨捐助。

香港中文大學為表彰包博士對世界航運和香港工商界的巨大貢獻，對青年教育的一貫贊助，恭請 監督閣下頒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余英時教授

余英時教授是學術、教育界卓越的人物，出身本校新亞書院，畢業後赴美深造。一九六二年得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七年後受聘為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當時他只有三十九歲。一九七三年休假時，他回到本校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兼任大學副校長，一九七五年重返哈佛任教。最近耶魯大學禮聘為 Charles Seymour 講座歷史教授。

余教授雖然專攻中國歷史，可是其他方面，學問也極其淵博高深。除了所著「漢代對外貿易及發展」馳譽學術界之外，還有許多關於中國哲學和文藝的論著。對於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尤為精到。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擔任本校副校長期內，余教授曾擬定許多研究中國文化計劃，並親自推進各學科的溝通合作。一九七四年出任教育方針及大學組織工作小組主席，促成若干建議，成為一九七六年富爾敦委員會重要參考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為表彰余教授在學術上的傑出成就，和他對本校發展的寶貴貢獻，恭請 監督閣下頒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榮譽法學博士余英時教授講詞

大學與中國的現代化

——一個歷史工作者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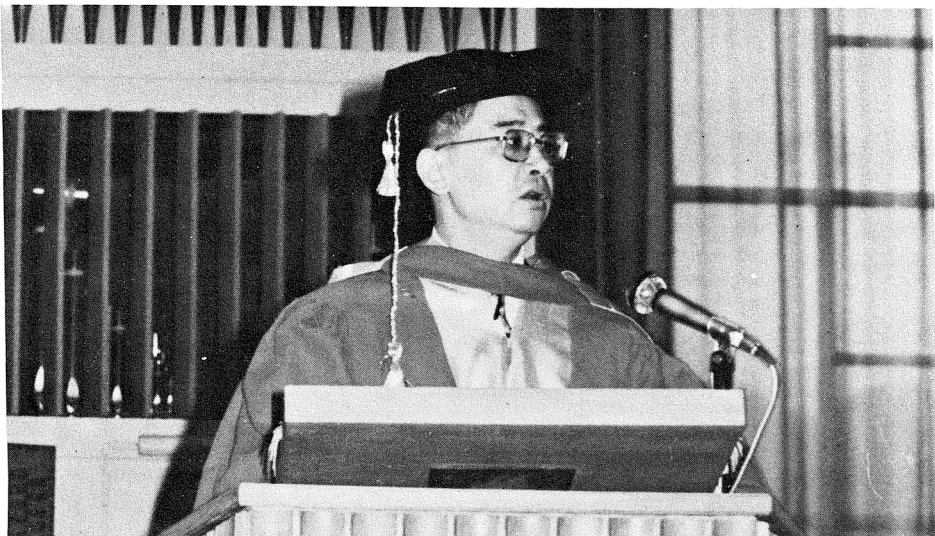
「我甚至可以承認，每一個國家和社會都有責任，根據需要，為它的學術機構制定發展的方向，但是一般性的指導和業務上的干涉之間有基本的不同。現代大學如果經常受到外來力量的直接插手，它就失去了學術的自主和自由。這樣一來，知識就不能生長了。」

……儘管我主張相對的學術的自主和自由，我決無意提倡大學是「象牙之塔」的舊觀念。祇要我們能在大學裡保持教學、研究、和服務之間的平衡，保持知識的求取、傳授、和應用之間的平衡，我們向現代化航行的學術途程是安全的。」

在中國歷史上，大學一向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傳統的說法，以為夏代已有類似大學的高等學術機構了。但是夏代的存在至今還沒有在考古方面得到證實，所以暫且撇開不說。甲骨文中有「學」字，並且照上下文來看，確是指學校說的。可惜我們還無法斷定它是怎樣一種學校。我們現在所用的「大學」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周代的文獻上，那是貴族子弟接受訓練的地方。周代的大學又叫做「辟雍」，金文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大學的起源，至少不比古代希臘的柏拉圖學院晚。

不過如果我們用現代大學的特徵作標準，比如說有校址，有教授，有學生，有講堂宿舍，有考試學位；這樣的大學是到漢代才有的，那就是太學。公元前一二四年太學的創立，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史上一件劃時代的頭等大事。漢代太學最多的時候有三萬多學生，有兩百四十所房子，二千八百五十個房間。這在今天來說，也是一所規模極大的大學了。

從漢末到隋唐，中國分裂了，太學也衰落了。但是在七世紀時唐太宗恢復了太學，中國的大學又有新的發展。唐代的太學和漢代在很



多方面都不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是漢代太學歸太常管，唐代改歸國子監。國子監相當於今天的高等教育部，專門負責教育學術的。而太常在漢代主要是管宗教事務的。這個改變非常有意義，是表示教育學術已脫離宗教而獨立。這一點中國遠走在西方的前面。第二是漢代太學裏面祇偶而有一兩個外國學生，像匈奴的「質子」，唐代是一開頭就有招收外國學生的政策。所以唐代的太學，外國學生特別多，可以說是當時東亞世界中一個國際性的大學。第三是漢代太學只研究五經，唐代却擴大到算學和法學，近乎今天的專門學院。像 Abraham Flexner 所說的「現代大學」，在唐代已具體而微了。

宋代是太學的盛世。它的規模大體是依照唐代，但是有新發展。專門學院方面增加了醫學和繪畫。又因為印刷發明了，圖書館遠比從前進步，太學有自己的圖書館，同時國家的圖書館，就是秘書省，也很近。秘書省和國子監關係非常密切，秘書省的藏書很多都是國子監刻印的，就是所謂「監本」。還有一點，宋代太學的校園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從設計到監修都是李誠一手負責。李誠是當時的「將作少匠」，專管營造工程。他是中國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師之一，留下了「營造法式」一部傑作。

宋代太學的重要性當然不是在設備建築這些物質方面。最要緊的是它後面有一種新的文

化精神。從太學一方面看，這種精神表現在對教育學術本身的價值有很清楚的認識，同時又能密切注意到社會的需要。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說宋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始，這在學術文化方面看尤其有道理。宋代太學前後聘請了許多傑出的教育家，在學生中更造就了無數人才。不但如此，在名教育家胡瑗主持之下，太學的課程分作「經義」和「時務」兩部份，把理論和實踐都照顧到了。這更是教育史上帶有革命性的一番創舉。在「時務」一部份，其中包括當時最重要的邊防和水利灌溉。我們知道，大學研究和國家需要打成一片，這是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在美國發展起來的，是一個嶄新的觀念。僅憑這一點，我們已不難看到中國當時教育思想的進步。

談到宋代的高等教育，我們不能不提及時新興起的書院。書院是中國所特有的學校，在西方找不到和它相當的制度。在教學方式上，它有點像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在注重人格陶冶上，又有些近乎英國的學院制；但又都不一樣。宋代以後，太學衰落，高等教育幾乎完全操在書院手裏，它在中國近世學術的傳播方面，其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中國人一向看重「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但祇有在書院普及以後，這個理想才得到落實。明代泰州學派的社會講學，風靡了全國。泰州學派中有樵夫、陶匠、石匠、農夫、商人等等，真可以說把教育傳到了平民大眾的手上了。當然我們知道，唐代太學已偶然雜有工商的子弟，宋代太學生中也有家境極

貧寒的，但這些都祇是例外。直到書院出現，中國的高等教育才帶有平民的氣味。

學生運動

以大學為基地的學生運動，在西方還是一個比較新的現象。比較早的恐怕要算十九世紀的俄國。但是中國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遠在二世紀就發生了，即東漢太學生和宦官集團的鬭爭。北宋末年太學生的愛國運動先後不下十次之多，其中有一次有軍民十萬人參加，要求政府抗金。今天第三世界許多學生運動都起於捍衛民族的獨立，但在中國，宋代的太學生已經是這樣了。宋代以後，書院代替了太學，所以十七世紀有波瀾壯闊的東林運動，起於無錫的東林書院，傳播到全國。直到今天，東林的風範還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反抗有感召的力量。

我在上面一直強調中國的大學傳統裏有現代的成份。我深信傳統和現代決不是勢不兩立的；舊社會中也有些好的東西可以適合新社會的需要。清末教育改革的時候，對新的大學觀念很快的接受了，這也許正是因為中國本來就有這樣的傳統。事實上，在京師大學堂的創立和各省書院的革新開始的時候，它們都是很傳統的，仍然是太學和書院的舊格局。但不久之後，這些學校便變成新思想的根據地了，京師大學堂，即後來的北京大學，尤其起了極大的作用。

「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是思想革命的大本營，這是一場極端反傳統的思想革命。但革命的後面還是有傳統的力量在暗暗發生作用。思想革命發源在大學裡便多少有些傳統的背景，因為宋、明的書院便一直是新思想發展的源頭。西方近代最大的思想革命是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運動；可是當時的法國思想家便顯然和大學沒有關聯。再以學生的愛國運動來說，宋代的前例更不可忽視。我們不能說，「五四」以來的學生運動全是從西方學來的。

但是我雖然讚美中國舊有的大學傳統，却毫無主張復古的意思。大學不是超時間的。它一方面是時代的產物，一方面也會影響現在和未來。我們應該看重的正是現在和未來，而不是過去。

現代大學的特點

在中國來說，所謂現代大學和傳統大學最大不同之處便是對於知識的態度。太學和書院都是傳統的大學，它們經常受到政府的干涉和思想的控制，王安石變法時代和明初，太學便因爲思想的控制而遭到困難；張居正封禁全國書院更是政府干涉的鐵證。在這種情形之下，學校沒有學術自主，知識的成長是很困難的。傳統的大學當然也注重知識，但它們最關心的還是怎樣保存舊知識，而不是尋求新知識。在傳統的價值系統裏，知識沒有獨立的地位。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首先就強調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接着又要學生在追求學問時，不能先存任何學問以外的動機。這是一個現代的新觀念，北大的現代化便是這樣開始的。

照今天多數教育家的意見，現代大學有三個重要使命，一是教學，二是研究，三是爲社會服務。三者缺一不可。以前康乃爾大學校長 James A. Perkins 一九六五年指出，知識也有三個屬性，剛好和大學的三個使命相合，那就是知識的求取、傳授、和應用。這樣看來，現代大學是和知識完全融化成一體的。事實上，因爲現代生活越來越專業化，知識已成爲大學的專利品了。十九世紀以前西方的科學和學術還在業餘研究者的手中，今天這已辦不到了；中國傳統的餘暇治學的觀念，現在也行不通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都是大學的事了。這和現代知識的本質有關。研究工作今天需要大規模的圖書館和實驗室，有時更需要科際合作，這些都要靠現代大學來供給才辦得到。

今天的世界充滿了敵對和危機，所有國家的生存都得依賴現代知識。對於所謂「落後的」國家和「開發中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而根據上面所說的現代知識的性質，我們無法想像現代化可以離得開現代大學。

發展現代大學，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困難。

難。光靠設備是不夠的；我們的想法也需要調整。知識的本質是祇有在一個具備了相對的學術自主和自由的環境裏才能成長。我說「相對的」，因爲我並不相信在任何社會裡可以有絕對的學術自主和自由。我甚至可以承認，每一個國家和社會都有責任，根據需要，爲它的學術機構制定發展的方向，但是一般性的指導和業務上的干涉之間有基本的不同。現代大學如果經常受到外來力量的直接插手，它就失去了學術的自主和自由。這樣一來，知識就不能生長了。

最後，我願意說明，儘管我強調知識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性，我決無意把知識的價值提高在一切其他價值之上；儘管我主張相對的學術的自主和自由，我決無意提倡大學是「象牙之塔」的舊觀念。祇要我們能在大學裡保持教學、研究、和服務之間的平衡，保持知識的求取、傳授、和應用之間的平衡，我們向現代化航行的學術途程是安全的。六十年前懷悌海警告過：「在現代生活的條件下，有一條鐵則：任何民族，如果不尊重經過訓練的才智，那是注定無法生存的。」這話今天讀起來使人不寒而慄。我們試想想，除了現代大學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可以訓練才智呢？

中國的大學傳統有它非常輝煌的歷史。在中國現代化的初期，這個傳統會起過指引的作用。我們希望它將來還能繼續發揮它的潛力！

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講詞



以往本校舉行畢業典禮時，我通常不發表正式演講。但是今天我答應各位師生的要求，破例的談談一個經常思考的題目——這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特色和抱負。

我參加中文大學第一次頒授學位給本校畢業生的典禮時，深深感覺榮幸。那確實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場合——對香港的高等教育，對香港的中國人，特別是對他們的子女，以及對身為第一任中文大學校長的自我，意義都很重大。我記得很清楚，當我親眼看見第一位畢業生站在監督面前正式領受學位時，我如何深受感動。今天我在此地又親眼看見同樣的典禮進行，我更感動有加，因為大學已經到了十四歲成熟的年齡了。

中文大學誠然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同其他國家的古老大學比較，中文大學還只是個嬰兒。這樣比較，或許暗示中文大學年資太淺，不免有所欠缺。但是在我看來，情形正好相反。中文大學年輕是一項寶貴資產，它是繼續成長和不斷適應今日世界迅速變化的力量和彈性的泉

源。同時年輕才會有遠大抱負，才會有創造力和決心。我想這些都是這所年輕的中文大學具備的特色。

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具有適應和創造的能力，這在世界各國已成爲自明之理。本世紀下半期有兩大突爆——即人口突爆和知識突爆。無數新的國家成立了。科技知識也加速擴張了。最近十年之內，新知識的產生比過去歷代都多。關於這些新知報導的整理，本身已經成爲一門學問。這兩種突爆是對所有大學的嚴重挑戰，因爲大學的主要任務本來就是活學活用各種知識，從而應付社會的各自需要。在開發中的國家，大學被視爲社會、經濟、工藝、文化發展的主要工具。爲着應付這些繁重的要求，大學一定要有相當於這些要求的組織和計劃。

歷史悠久的大學往往套着反映古老社會的僵硬結構，同時受種種不相干的傳統的束縛和既得權益的牽制。因此這些學府往往和現實脫節，而不能有效地適應社會對它們的要求。在

大多數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這些學府都在極其艱難的設法打破傳統的定型，或將新觀念新方法導入過時的型式之中。這樣的自我更新的掙扎，要繼續多年，因為歷史的墮性極其強大，以致謀求適應的改變非常困難。因此，我們的年輕大學對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學雖然表示欽敬，但是對它們並不羨慕。

像所有的大學一樣，香港中文大學的設立也是為着應付社會的需要。香港是一個動態的學術自由的社會，其中反映五千年古老文化的多數中國人和當地的西方人相互影響，形成世界上最繁榮的工商業社會，中文大學從這個雙重型的社會，以及東西相互依存的關係裏面，確定它的傳統教育目標及其特殊教育使命。這兩個相互關聯的目的，已經形成中大成立十四年來的特色和發展的形態，而且我相信今後仍將是繼續發展的指針。基於這個事實，我想花一點時間談談這兩個從開始就誘導我努力以赴而且至今仍然鏗而不捨的主要目標。

中文大學第一個主要的教育目的，是適應本港青年男女的需要，培養他們的專長，使之在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組織裏面擔任重要的任務。這個教育目的之達成，乃因中大是一個現代化的大學——一個包含提供人文、藝術、自然科學、和數學、以及社會科學等本科教學科目的各別組成單位的綜合學府。在若干學科方面，中大並提供研究院科目和專業教育。它所屬的各種研究所、研究中心及其出版書刊，亦

有助於學術水準的提高。同時它的教學人員也多貢獻其專門學識於各團體及個人，作為對香港公眾的服務。在上述各方面，中文大學都要求達到國際最高的水準。當然，我所說的，是世界上許多地方現代化大學的公認範型，而這也代表中文大學首要的基本教育目標之制度建立。

不過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個基本範型只是兩個主要教育目的之一。另外一個教育目的，就是我們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深切關懷，而這一點也是中文大學的特殊使命。

中文大學自始就把促進中西學術文化傳統的交流與融合，定為特殊的目標，它要求每一個學生深刻了解自己的中國文化傳統，並精通西方的實證方法和科學知識。通曉中英兩種語言是了解與溝通不可缺少的工具。中文大學期望諸位畢業生浸潤於兩大文化之間，而收其相輔相成之效。

中大為順利完成這一項特殊使命，在制度上就必須負起保存和發揚中國學術文化傳統的責任。這一項責任已經直接納入大學各部門的任務之中，同時表現於有關中國文化的種種研究、翻譯、和出版的計劃。當然，大學在制度上所負的責任，也成為各位同人在教學和研究上尋求適當表現方法的親身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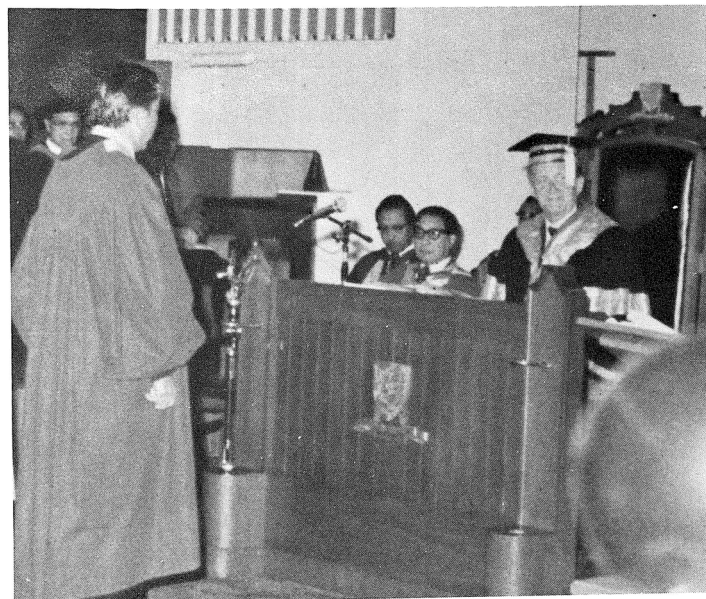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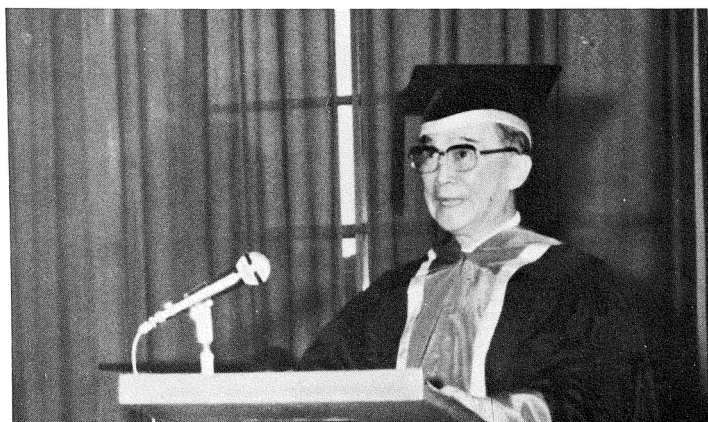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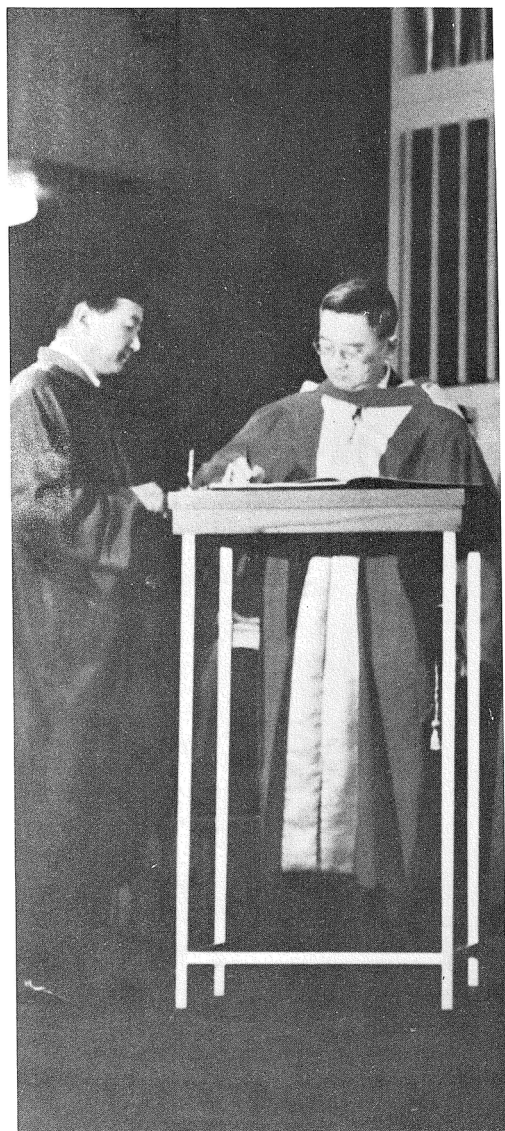
前面已經說過，大學的特色和目標乃導源

於其所服務的社會。就這一方面來說，中文大學最為幸運。在一個學術自由的環境裏面，香港中文大學能為一個充分代表中西文化交流的社會服務，並獲得政府的鼓勵和大力支持，在完成其所負的特殊使命上可謂得天獨厚。因此，我們衷心感謝香港政府和目光遠大的當局。但是我們希望表明，中文大學在為本港社會服務的同時，並致力於一般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而且兼顧世界各國其他大學在學術方面的需要。

至於本港的友好多年來熱心支持這所年輕的大學，並慷慨貢獻其時間與金錢，以培養它的長成，我要特別對他們表達衷心的謝忱。

我在十四年前曾經說過，中文大學應該是國際性的大學。在它創立的時候，曾經得到世界各地名流學者的寶貴意見，現在仍然不斷得到他們的忠告。我們訂定的種種創新計劃，都得到國際基金會的大量資助；外國政府也支持我們的教學方案。全世界著名大學的傑出學者（包括海外中國人士）參加本校教學的人數與時俱增，同時每年都有許多國家的學生到本校來求學。我對所有這些國際人士對本校表現的多方面興趣和協助，實在非常感激。

最後，我要向今天接受學位的諸位致賀，並祝你們前途無量。我希望將來你們都像我一樣，對你們在這所年輕的學府度過的美好歲月引為榮幸，且將永誌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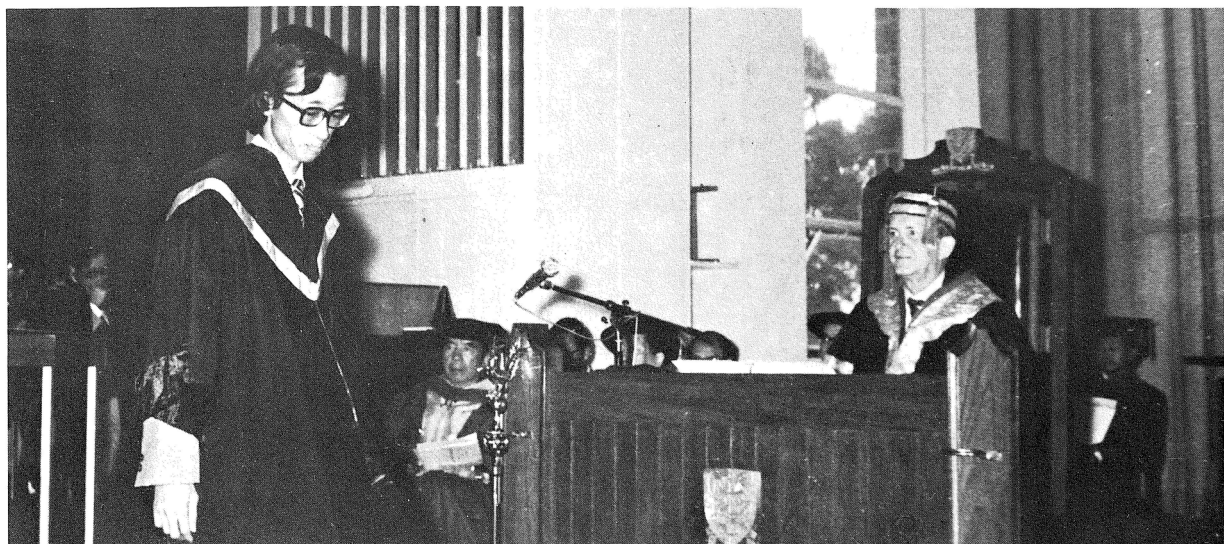
(左) 余英時博士在榮譽博士名冊上簽名 (右上) 鄭德坤
副校長宣讀讚詞 (右下) 包玉剛博士接受學位



大學監督麥理浩爵士蒞臨，校董會主席簡悅強爵士、李卓敏校長、鄭德坤副校長、鄭棟材副校長迎迓。



(左起) 鄭棟材副校長、簡悅強爵士、余英時博士、麥理浩爵士、包玉剛博士、利銘澤博士、李卓敏校長、鄭德坤副校長



典禮後茶會



麥理浩爵士與李卓敏校長伉儷



麥理浩爵士與候任校長馬臨教授

中文大學融滙中西文化

（候任校長馬臨教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月九日在西區扶輪社午餐例會講詞）

中文大學從成立到現在，已達第十五個年。

在這短短的期間內，因為創校人士高瞻遠矚，校內同人齊心協力，政府全力資助，和本港社會各界人士及國際友人的熱心支持，所以有目前的成就。我願意假今天的機會，向各位報告一點中大之近況。

中大建校之初，在校長李卓敏博士的主持之下，便已定下了發展的方針與抱負，使全校的教學和研究計劃有確定的目標，同人有所依循能夠全力以赴。那麼中大的方針和抱負是什麼呢？

（一）中大是為適應香港社會的需要而設立的大學，首先自然要為社會培養各方面的專門人才，使他們能在迅速而高度發展

的香港社會上，擔任重要的任務。開辦初期大學本科學生只有一千六百餘人，現在已增加到研究生、外國學生、本科學生四千六百人以上。中大歷史短，傳統之束縛也少；唯其年輕，才更有彈性和活力，可以隨時應付重大的挑戰。

（二）中大對中國學術文化有深切的關懷，所以除了要求學生通曉西方的實證方法和科學知識外，還要在教學和研究方面負起保存和發揚中國文化傳統的責任，並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大學各部門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這方面已經有了良好的表現。因為本港社會給了中大學術自由的環境，所以大學內部做起各項工作來更容易人盡其才，按照計劃進行，為實現既定的目標而努力。

中大雖有政府的全力資助，但如沒有本港熱心人士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各項計劃的發展仍難順利進行。就以校園的建設來說，從一片山頭，到今日的廣廈相望，幾乎沒有一座建築物沒有本地人士的慷慨資助。如利希慎基金會、已故關祖堯爵士、已故唐炳源博士等，都曾捐助巨款。在最近一年之中，又有二座新的辦公大樓落成啓用，一座文物館工作處落成，三座學生宿舍在建築中，一座大禮堂則定在明年開工。這些建築分別獲得何添慈善基金會、包玉剛博士、利希慎基金會、伯利恒有限公司和邵逸夫爵士的資助，各項捐款為數都達數百萬元之巨。本年度開始招生的三年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也得到了馮景禧先生、鄭裕彤先生和其他本港工商界人士的熱心資助，才得以開設，相信對工商業一定具有具體的貢

獻。

外國政府、國際友好人士和基金會的支持，當然也是幫助中文大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大學的教學、研究及校園的建設，歷年得到各方的資助，裨益至巨。

本年度大學新設專供海外學者進修研究之國際亞洲研究課程，目的在促進國際間對於亞洲的認識。這項課程是由星島基金會、雅禮協會、日本創價大學等資助開設的。

在國際資助方面，最近還有幾件可喜的消息，可以向諸位報告：

第一，世界衛生組織最近設置專門機構，從事「由草藥中提煉有助於節育成份」之世界性研究，在倫敦、芝加哥、漢城、巴西、錫蘭及香港共成立了六個研究中心。世界衛生組織鑒於本校理工研究所中藥組以前在其資助下進行同類研究，成績斐然，特將香港之研究中心設於本校，今年與本校簽訂合約，並即撥款十四萬美元，展開為期兩年之研究工作。如此廣泛之世界性實驗研究工作，在草藥研究史上，尚屬首次。此不僅為中文大學之無上榮耀，而香港亦聯帶進入國際科學研究行列。

第二，洛氏兄弟基金會和亞洲協會宣佈於一九七八至七九年捐贈中文大學翻譯中心美金約七萬元，作為資助中英互譯的研究，出版和教學發展之用，並且表示今後將指定日本和香港

為亞洲區的研究中心，以此為該基金會捐助的對象，而香港的研究中心就是中文大學的翻譯中心。此外，另一基金會也已決定自一九七八年四月起捐款美金五萬元，協助翻譯中心編譯一册新的漢英辭典，為期三年。翻譯中心於一九七三年秋起開始出版一種中譯英的半年刊「譯叢」*Renditions*，專門翻譯中國人文學科中的優秀著作為英文，可以說是出版界之創舉，備受國際學術人士歡迎，至今尚未有同類刊物出現。

以上兩項國際的資助，雖款項不大，但從中文大學在國際學術地位上受到重視的意義來看，則是頗為可喜的事。事實上，這些年來，大學各部門多少都有類似的成績的表現，受到類似的國際上的重視和幫助。

第三，香港快捷半導體有限公司捐贈中文大學電子系一部集成電路光掩膜自動重攝機，這非但是香港所有的同類機器中的第一部，至今也還是唯一的一部。這套價值美金十四萬元之機器，不僅使本校的電子系在教學和研究上增加了極大的便利，並可以進一步向本港工業界提供服務，使今後光掩膜之加工工作，毋須寄往英美等地進行，而可在本港完成。另一方面，中大電子系有了這種機器之後，可以訓練學生裝配和使用同類機器，使他們成為熟練的技術人材。香港電子工業總有一天會購置這類機器，今後不愁會缺乏有經驗的人才加以運用。以上所略略提到幾項研究計劃，如有機會，負責的

同人一定樂意向諸位作更詳盡的報導。

李卓敏校長自本校創立以來，屢次聲明，他心目中的中文大學是一所國際性的大學，一方面要求大學的學術地位得到國際的承認，同時也要求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具有國際的規模。到了現在，我們可以說，中文大學的發展已不止是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同時還進一步成為一所融滙中西文化的高級學府。因為中文大學重視西方的實證方法和科學知識，所以更能發揚光大中國學術文化，也更能處處吸收最新的歐美科學方法和知識以為己用，加以融會貫通，創造出自己的教育和學術上的特色來。中文大學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亞洲課程部的開辦，一九八〇年醫學院的設立，和以上所提到的三項研究計劃所得到的國際資助，多少可以看出中文大學在各方面的努力和獲得的成果。中大發揚光大中國傳統文化和融滙中西文化的方針和特色，使中大更深入本港社會的人心，得到他們熱烈的共鳴，因此取得他們全心全力的支持。

我一開始就指出，中文大學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政府的全力資助外，主要依賴本港社會各界人士和國際友人的熱心支持。我以多年服務中文大學的一分子的地位，謹在此向各方面表示深切的感謝，同時衷心希望本港人士和國際友好今後能和以前一樣，繼續給我們批評、指導和支持，使中文大學能在教學和研究方面繼續發展，並且實現服務社會的抱負。

各界捐贈

(一九七六年中至一九七七年)

中文大學屢獲外界慷慨捐款，作為發展校園建設、添置儀器、贊助研究計劃、設立教職員進修及學生獎助學金等之用；此外，大學又獲贈不少書籍及中國書畫文物。

校園建設

- (一) 利希慎基金會捐贈五十二萬三千港元，興建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工作處。
- (二) 香港蜆殼有限公司捐贈十六萬四千港元，興建三個網球場。
- (三) 何添慈善基金會捐贈十二萬港元，擴建碧秋樓。
- (四) 雅禮協會再度捐贈亞洲課程部建築基金，贈款一萬美元。

添置儀器

- (五) 香港快捷半導體有限公司捐贈集成電路光掩膜自動重攝機予電子系。
- (六) 瑪利吳特基金會捐贈六千美元，作為大學圖書館裝置一座麗確特縮微膠卷沖洗機的部分

費用。

- (七) 香港雅基利洋行捐贈一座連續波染料激光器染料循環激發器。
- (八) 香港電台電視部捐贈一批黑白電視器材。
- (九) 林秀槐先生捐贈一萬四千四百港元，作為文物館購置攝影器材之用。

研究計劃

- (一)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捐贈四萬九千二百美元，作為研究益母草計劃的首期津貼；最近又捐贈十四萬美元，資助中藥研究組一項有助節育的草藥的研究。
- (二) 亞洲協會捐贈二萬七千美元、陶氏化學製品太平洋公司每年捐贈五萬五千美元（一九七七及七八年），資助中藥研究組的研究計劃。
- (三) 哈佛燕京學社捐贈三萬一千五百美元，作為研究及其他需要的費用。
- (四) 利榮達先生捐贈十六萬一千六百港元、（香港）李氏基金會捐贈六萬二千港元、德成置業有限公司捐贈六萬港元，資助對針灸戒毒的生物化學研究。

(五) 嶺南大學董事會捐贈二萬二千六百七十美元，作為社會研究中心為期三年的中國公社研究計劃第一、二年的研究經費。

(六) 國際發展研究中心捐贈一萬七千美元，資助社會研究中心有關官僚行為的研究計劃。

(七) 亞洲協會捐贈：

- (甲) 六千美元，作為資助電腦翻譯研究計劃最後一期的津貼；
- (乙) 五萬美元，贊助一項為期兩年的食用菌類特別是草菇的研究計劃；
- (丙) 三千五百美元及五百美元，分別資助傳播研究中心研究沙田新市鎮的傳播形式及香港電台服務市民的節目；
- (丁) 九千六百港元，資助一項有關國際教育交換研究在香港區進行的工作。
- (五) 亞洲協會及洛氏兄弟基金會捐贈一萬二千美元，資助翻譯中心的翻譯及出版計劃。
- (六) 羅桂祥先生捐贈二萬四千港元，資助「中國歷代飲茶風尚及茶具之研究」計劃。
- (七) 徐亨先生先後捐贈二萬五千港元，作為研究之用。
- (八) 鄭慶飛先生捐贈一萬港元，資助一項菌類栽

培的研究。

教職員進修及學生獎助學金

- (三)嶺南大學董事會捐贈二萬美元，作為嶺南教職員進修獎學金。
- (三)林炳炎基金會捐贈二萬五千港元予文物館，作為訓練一名文物館助理的獎學金。
- (三)亞洲基金會捐贈二千四百美元，資助一名電子計算學系副講師前往英國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攻讀碩士學位。
- (三)星島基金會捐贈四萬零五百美元，資助亞洲課程部獎助學金計劃。
- (三)林安行先生捐贈二十萬港元，設立林靄堂獎學基金，贈予教育學院學生。
- (三)香港荳品有限公司——孟山度教育基金會捐贈十五萬港元，資助因家境突變而致經濟陷於困境的學生。
- (三)美國大通銀行由一九七六年九月起，每年捐贈六千港元，設立一項獎學金，贈予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二年級學生。
- (三)生力啤酒廠捐贈六千港元，增設一項「生力啤獎學金」，使一九七六——七七年度生力獎學金增至四項。
- (三)免稅品商店有限公司捐贈六千港元，設立一項獎學金，贈予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學生。
- (三)李尚信博士每年捐贈五千港元，設立多項「李尚信學術獎」，贈予研究院宿舍宿生。
- (三)萬順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景福先生捐贈三項獎學金予修讀會計與財務學的學生，每項

獎金一千七百五十港元。

- (三)崇蘭中學校監曾璧山女士及方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學堯先生各捐贈兩項獎學金予教育學院學生，每項獎學金一千七百五十港元。
- (三)永亨銀行每年捐贈兩項獎學金予聯合書院家境清貧、成績優異的學生，每項獎學金一千七百五十港元。
- (三)滬江大學香港同學會獎學金委員會由一九七六——七七年起的十年內，每年捐贈一千港元，贈予兩名學生作為助學津貼。
- (三)香港美孚有限公司通過美國商會由一九七六——七七年起的三年內每年捐贈五千港元，設立一項獎學金，以紀念美國建國二百周年；另外一位隱名氏捐贈五千港元，作為一九七七——七八年「美孚／美商會建國二百周年獎學金」的增添款項。
- (三)香港快捷半導體有限公司每年捐贈三千港元，設立一項獎學金，贈予電子系學生。
- (三)唐天榮律師行捐贈一千五百港元予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設立唐天榮律師行學業優異獎，分三年頒贈，每年五百元。
- (三)雍仁會香港分會捐贈一千港元，設立獎學金贈予主修生物、化學、數學或物理的本科生。
- (三)市場推銷研究社捐贈一千港元，設立市場推銷研究社獎學金，贈予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二年級學生。

其他用途

(三)日本基金會分三年捐贈卅九萬四千港元，資

助增聘日文教師計劃。

- (三)嶺南大學董事會每年捐贈二萬美元，作為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一九七六——七七年度至一九八〇——八一年度經費。
- (三)亞洲協會及洛氏兄弟基金會捐贈六萬二千港元，在校外進修部開設研究院程度的中英翻譯文憑課程。
- (三)香港西區扶輪社捐贈六千五百港元，作為就業輔導處印刷「香港職業指南」一書的費用。
- (三)嘉禾影片公司鄒文懷伉儷及國泰影片公司連福民先生合捐二千五百港元，供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購置書籍之用，藉以紀念已故凌約翰先生 (Mr. John C. Linker)。

書籍文物

- (三)瑞士總領事捐贈一批有關瑞士文化的書籍及麥斯費治 (Max Frisch) 的德文著作。
- (三)德國研究協會捐贈二百種德國文學、哲學、音樂書籍及德國音樂唱片。
- (三)利榮森博士贈予中國文化研究所下列書籍：「佩文韻府」、「資治通鑑」、「金石萃編」、「十三經注疏」及「九通」。
- (三)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同學會捐贈聚珍做宋版「四部備要」叢書一套。
- (三)敏求精舍贈予文物館一批玉花，供研究用。
- (三)林秀槐先生贈予文物館一個「清康熙青花纏枝花盃」。
- (三)李張名馨女士捐贈一批北魏及唐代碑帖拓片。



杖權學大文中